

南宋御前宫观在元代的变迁 ——兼论江南几个道派的沉浮

江西师大历史系 吴小红

《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Quinsay: 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 2012 年，508-536 页

“杭俗崇尚释老，其来已久”^①。南宋都城临安，寺院宫观众多。据《咸淳临安志》，南宋末期，临安府下辖 9 县有佛教寺院庵堂 770 余所，道教宫观 67 所。诸佛寺道观“率以得列御前为重”^②，一旦“得列御前”，则“奉三宫元命，以祈千万寿”^③。这些为皇室祈求永命的御前寺观实力强大，“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④。

临安府 67 所道教宫观中，“得列御前”的重要宫观均在杭州城内或近郊，共 9 所。宋末钱塘人吴自牧《梦粱录》载：“御前宫观在杭城者六，湖边者三。”^⑤杭州城内的 6 所御前宫观是新庄桥南的东太一宫（又作太一宫、太乙宫、东太乙宫）、城东隅兴礼坊西的佑圣观、七宝山的三茅宁寿观（简称三茅观，或宁寿观）、泰和坊内的开元宫、后市街的龙翔宫以及三圣庙桥东的宗阳宫。西湖边的 3 所是涌金门外西湖东岸的显应观、孤山的四圣延祥观（简称四圣观，或延祥观）和西太一宫（又作西太乙宫）。

这 9 所御前宫观与赵宋帝后的关系均极密切，甚至关乎国祚。其中 4 所系宋帝潜邸改建：佑圣观由孝宗潜邸改建，甚至有传言，观中供奉的佑圣真君像系肖孝宗

^① [宋]周密撰，[明]朱廷焕辑：《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引《杭州府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30a 页。

^②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一》，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宋元方志丛刊》本影印清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第 4026 页。

^③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一》，第 4026 页。

^④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七十四《食货上二·方田赋税》，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点校本，第 4222 页。

^⑤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八《御前宫观》，《知不足斋丛书》本，第 8a 页。同书卷十六《城内外诸宫观》（第 5b 页）又称：“今摭宫观在杭者，除御前十宫观外，编次于后。”则御前宫观有 10 所。综合各种史料，笔者推测两者的差异在于万寿观是否被列入“御前”（请参阅本文第三部分）。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万寿观》（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37 页）：“万寿观，以奉皇帝本命星君。大殿曰纯福。掌观内侍二人，道士十一人，吏卒一百五十五人。道士岁费县官钱七百九十二千、米百有二十斛。绍兴十七年建。”由此，万寿观最初仅是供奉高宗赵构本命星君的道观。另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第 3482 页）：“万寿观，在新庄桥西。绍兴十七年建，以奉皇帝元命。殿东乡，挹生气也。为三室：昊天曰太霄殿（玉像），圣祖曰宝庆殿（金像），长生帝曰长生殿（神位）。西则皇帝元命殿，曰纯福。后殿十有二楹，为二十二室。太祖曰会圣宫，曰章武殿。由太宗皇帝而右凡六庙，皆一宫，曰会圣。由徽宗皇帝而右凡七庙，皆二宫，曰会圣，曰应天启运（塑像），皆以存旧京遗制。前殿之东又有真宗皇帝室，曰延圣；章惠皇后曰广爱，温成皇后曰宁华。每四孟朝献毕，车驾由御圃诣诸殿，行烧香礼。景定二年，改道院斋阁，以奉寿和圣福皇太后元命。”由此，到南宋度宗时期，万寿观不仅供奉高宗赵构和度宗之母寿和圣福皇太后的元命，还供奉宋朝自太祖赵匡胤以来的 14 位皇帝，很是重要。《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共录 10 所宫观，除吴自牧记载的 9 所御前宫观外，还包括万寿观，列于东、西太一宫之后，同样说明万寿观之重要。另据《梦粱录》卷九《内司官》（第 13b 页），内司官中有“御前诸宫观官、太庙营、景灵万寿宫老儿营”等，似又将万寿观归为御前宫观。如此种种，令笔者难以断定万寿观是否为御前宫观，故后文只研究吴自牧确指的 9 所御前宫观。

御容而成^①；开元宫由宁宗潜邸改建而成^②，龙翔宫和宗阳宫则分别由理宗和度宗潜邸改建^③。2 所以供奉曾给予高宗赵构母子特殊护佑的神灵为主：四圣延祥观建于绍兴十四年（1144），供奉紫微北极大帝驾前的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四将，相传赵构出使金国期间，以及韦太后被北虏时，均获四将护佑^④；显应观建于绍兴十八年（1148），供奉磁州人长期崇奉的崔府君^⑤，相传赵构北使金国时，受到崔府君及其神马的护佑，而孝宗诞生，也与崔府君显灵有关^⑥。2 所以供奉祈求宋祚永长的神灵为主：佑圣观供奉北极佑圣真君，传此真君“克相炎宋，宠绥四方”，“佑我宗社，万亿无疆”^⑦；开元宫系供奉火德的专祠^⑧，而在“五德终始”观念中，火德代表着宋朝历运，是宋朝正统的象征。9 所御前宫观还普遍供奉南宋诸帝、诸后的本命（元命）星君^⑨，部分宫观内兼供感生帝^⑩，或设神御殿¹¹，每届皇帝、太后的本命日，相关的御前宫观都要奉旨举行盛大的斋醮活动。

正由于此，南宋时期，这 9 所御前宫观地位特殊，“属内侍提举宫事，设立官司、守卫兵士，凡宫中事务、出纳金谷、日膳道众、修崇醮款，凡有修整宫宇，及朝家给赐银帛，殿阁贴斋钱帛，并皆主计给散。羽士俱沾恩甚隆，外观皆不及也”¹²。“御前宫观，悉免科役”¹³，且备有皇帝车驾临幸时憩足的内苑¹⁴，某些宫观附近还设有专门的护卫兵营¹⁵。御前宫观的职责，主要是为赵宋皇室提供祈禳服务，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佑圣观》，第 38 页。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八《御前宫观·开元宫》，第 12b 页。

^③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第 3484 页，第 3485 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延祥观》，第 39 页。

^⑤ 关于崔府君，宋人有三说：一是北魏的崔伯渊，二是东汉的崔子玉，三是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的相州滏阳县令崔瑗。楼钥奉敕撰《中兴显应观记》时，认定崔府君是崔瑗，故南宋多采“崔瑗说”。参阅杨倩措：《南宋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19-21 页。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显应观》，第 39 页。

^⑦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第 3483 页。

^⑧ 吴自牧：《梦粱录》卷八《御前宫观·开元宫》，第 12b 页。

^⑨ 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第 3481-3488 页），御前 9 宫观均建有本命殿。东太一宫有高宗本命殿介福殿（光宗时改崇福殿）、孝宗本命殿崇禧殿、度宗元命殿申佑殿、度宗母元命殿顺福殿。西太一宫有度宗元命殿德辉堂、度宗母元命殿明应堂。佑圣观后殿奉度宗元命。开元宫、龙翔宫和宗阳宫均设度宗元命殿申佑殿、度宗母元命殿顺福殿。四圣延祥观有“皇帝元命阁曰清宁”。宁寿观和显应观亦各建一殿，奉度宗及其母元命。关于本命（元命），张帆《元朝皇帝的“本命日”——兼论中国古代“本命日”禁忌的源流》所论甚详，载《元史论丛》第十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第 21-46 页。至于本命信仰与释道二教的关系，还可参看刘长东《本命信仰考》，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 年第 1 期，第 54-64 页。刘文又收于氏著《宋代佛教政策论稿》附录二，成都：巴蜀书社 2005 年。

^⑩ 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第 3484 页、第 3485 页），龙翔宫奉理宗感生帝，宗阳宫奉度宗感生帝。所谓感生帝，据阴阳五行之说，天有青、赤、黄、白、黑五帝，君王乃其母与五帝之精相感而生，此所感之帝即感生帝。

¹¹ 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第 3483 页、第 3484 页、第 3487 页），宁寿观有徽宗、钦宗和高宗神御殿，佑圣观有孝宗神御殿，开元宫有宁宗神御殿，龙翔宫有理宗神御殿。

¹² 吴自牧：《梦粱录》卷八《御前宫观》，《知不足斋丛书》本，第 8a 页。

¹³ [宋]余安裕：《冲天观记》，见[宋]邓牧：《洞霄图志》卷六《碑记·宋》，《知不足斋丛书》本，第 26a-27b 页。

¹⁴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园囿》（第 1a-6a 页）载，三茅宁寿观旁有东山、梅亭，四圣延祥观旁有御园（后改作为西太一宫），显应观南有聚景园，东太一宫内苑后的武林山则被视为杭城的主山，等等。

¹⁵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四《行在所录·禁卫兵》，第 3493-3494 页：“太乙宫营，在太学后。西太乙宫营，在葛岭。……佑圣观营，在观侧。四圣观营，在葛岭。”

部分宫观的斋醮活动也允许民间参与^①。对于这9所御前宫观在南宋的情况，学界已有所关注^②，认为其特点有四：一是朝廷出资创建，二是宫观的主首道士由官方选任，三是经常为皇家或国家作法事，四是有宦官参预管理^③。本文将重点探究南宋灭亡之后，这9处御前宫观在元代的衰弊、复振、地位升降等情况，并藉此讨论与诸御前宫观相关的江南上清派、龙虎山正一派和玄教这三个道派在杭城的势力变迁，以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元代江南道教的变化。

一 元前期原御前宫观的衰弊

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十八日，宋帝遣使纳降表、玉玺于元军南征大元帅伯颜^④，元军进入临安城。二月，元世祖诏谕临安新附官吏民军人等，内有“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⑤等语。可见，入元之初，杭州的宫观和道士是受到保护的。但是，由于皇朝替嬗，以及蒙元定都北国，杭州由帝都降为江南一座重要的中心城市，9所原御前宫观的地位随之下降。

首先，伴随着赵宋的灭亡，原御前宫观与皇室的密切联系宣告终结，其必然由全国最重要的一批宫观降格为区域性道观。可以想见，元军占据杭州后，尽管有诏谕保护宫观和道士，但9所原御前宫观中供奉的赵宋诸帝的神御和冥助宋祚的神像或被毁弃，或被度藏，原来专为皇帝、太后们举行的斋醮活动全部中止，宫廷内侍也退出了对宫观事务的管理，而那些为赵宋帝室服务的高道则或潜形遁迹，或转求新宠，或甘于平淡。诸御前宫观的地位下降，影响减弱，势在必然。

其次，新朝的同性质宫观兴建于北方的大都和上都，杭州的同类宫观必将失却原有功用。这是指祈求国运太平的东、西太一宫而言。两宫均供奉五福太一星。星

^① 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三月（佑圣真君诞辰附）》，每年三月三日北极佑圣真君诞辰日，佑圣观奉旨建醮，“士庶烧香，纷集殿庭”（第1b页）。

^② 段玉明：《南宋杭州的开封宫观——宗教文化转移之实例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第33-39页），主要考察了在临安复建的6处开封宫观（太一宫、万寿观、佑圣观、四圣延祥观、三茅宁寿观和开元宫。其中太一宫有东、西两处，实为7处）的情况。杨倩描《南宋宗教史》和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对南宋御前宫观的特征、宫观中的高士、本命殿、元命殿等更有多方面的涉及。

^③ 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第708页。同书第590-596页认为，包括御前宫观在内的宋代官宫观具备如下特点：一，官宫观往往有官方设置的专门管理机构，有宦官专领；二，置卫兵、清洁兵；三，设宫观使；四，优先得到官方资助或物质保障；五，多潜邸、出生地；六，皇帝时常亲临或委员致祷。两相比较，御前宫观具备了官宫观的一般特征，但全系朝廷出资创建，而有些官宫观相沿自前代官建或民建宫观。另，南宋御前宫观系宦官直接管理，就笔者目前所见史料，不管是直接参与宫观事务的宫观使，还是挂名而不理事的宫观使，诸御前宫观似均未设立。宫观使制度，即祠禄制度的存与废，本是宋元两代官宫观的重要变化，但因南宋御前宫观似未设此职，故本文略而不及。参阅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版；汪圣铎：《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07-115页。

^④ [明]宋濂：《元史》卷九《世祖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176-177页。

^⑤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第179页。

历学认为，太一及其佐神、主使之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疫疾、灾害之事”^①，以250年为一周期，行于乾、艮、巽、坤、中五宫，每宫住45年；所临之地，“岁稔，无兵疫”^②。朝廷崇奉五福太一，始于汉武帝^③，两宋供奉尤谨，皇帝多次莅临太一宫祈请酬愿。高宗至临安后，初于惠照僧舍岁祀该神，绍兴十七年（1147）始仿太平兴国（976-983）旧制，修建新宫，即东太一宫。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太史局奏五福太一临梁、益之地，请依北宋天圣（1023-1031）故事，建西太一宫。于是，析孤山四圣延祥观之地，在其左侧立西太一宫。宫观之事，一依东太一宫旧例^④。

蒙元统治者也很重视五福太一。至元十一年（1274），建太一宫于两都，由太一教掌教李居寿领祠事^⑤。此后，元帝多次下令于两都太一宫祭祀五福太一。如至元二十年（1283）三月，“祀太一”^⑥；次年十二月，再“祀太一”^⑦；大德元年（1297）正月，“建五福太乙神坛峙”^⑧；泰定二年（1325）二月，“命道士祭五福太一神”^⑨；至顺元年（1330）九月，“以立冬，祀五福十神、太一真君”^⑩。至顺二年（1331）正月，文宗“敕每岁四祭五福太一星”^⑪，并于二月令“创建五福太一宫于京城乾隅”^⑫。可见，自至顺二年（1331）始，元代两京的太一宫增为3所或4所^⑬，不定期祭祀五福太一的制度也改为每年的四次常祀。

既然早在元军占领临安之前，元朝已在两都拥有太一宫，且在此后一直予以祭祀，那么，位于杭州的东、西太一宫自然不再具有关乎国祚的重要地位。

最后，南宋入元之后不久，道教在经历了宪宗蒙哥八年（1258）的焚经事件后，再受打击。“至元十八年冬，钦奉玉音，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者，娶妻为民”^⑭；留存的道士“依着老子《道德经》里行者”^⑮，禁止行醮。在此背景下，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大

^①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十《郊社考十三·祭星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32页中。

^②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第3481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十《郊社考十三·祭星辰》，第727页下。

^④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第3482页。

^⑤ 《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第4530页。马晓林《元代两都的太一广福万寿宫与灵应万寿宫——太一教与刘秉忠祭遁》（《元史论丛》第十二辑，第105-112页）一文研究了元代两都于至元十一年十二月所建的太一宫，即太一广福万寿宫，可参看。

^⑥ 《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第252页。

^⑦ 《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第271页。

^⑧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第408页。

^⑨ 《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纪一》，第655页。

^⑩ 《元史》卷三十四《文宗纪三》，第766页。

^⑪ 《元史》卷三十五《文宗纪四》，第775页。

^⑫ 《元史》卷三十五《文宗纪四》，第778页。

^⑬ 元代实行两都制，二月，元帝一般居于大都。“创建五福太一宫于京城乾隅”之“京城”，未审仅指当时元帝所居之大都，还是包括两京在内。如是前者，则共有3所太一宫；是后者，则共有4所。笔者推测，这次在乾隅创建新太一宫，当与星历学所说五福太一行临乾宫有关；若一年四祭此星，则两都均当在乾隅创建新宫，故笔者倾向于认为两都共有4所太一宫。但是，这次新建的五福太一宫是否仍由太一教统掌，未得其详。

^⑭ [元] 张伯淳：《大元至元辨伪录随函序》，见[元]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b-41b页。

^⑮ [元] 释详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二，引至元十八月十一日圣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元刻本，第

肆扩张佛教势力^①。“略举杭州太一宫、四圣观、林处士祠堂、龙翔宫、伍子胥庙，绍兴鸿禧观及湖州安定书堂，镇江淮海书院等处，皆亡宋以前先贤名迹、江山形胜之地，远者百有余年，一旦皆被僧人强行抵赖，或称先系寺基，或云僧人置到，不经官府陈理，一旦使力逐出业主，将应有财赋钱粮等物据为己有”^②。仅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到二十四年（1287）春，杨琏真伽就“恢复佛寺三十余所”^③。这一恢复佛寺的过程伴随着许多道观、书院、祠宇等被强占为寺院，部分原御前宫观也在其列，屋宇房舍被强改为佛寺，田地产业被大肆侵夺，许多道士改投佛教或弃道为民。

被强改为佛寺的原御前宫观是西太一宫、四圣延祥观和龙翔宫，或许还包括显应观。南宋初，孤山上有智果观音院、玛瑙宝胜院、报恩院、广化寺等。绍兴十四年（1144）建四圣延祥观时，诸寺被迫他徙，空其地以建道观。淳祐十二年（1252），又分四圣延祥观地建西太一宫^④。正由于此，杨氏专擅江南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四圣延祥观被改为万寿寺，观中高宗之母韦太后赐予的沉香四圣小像及侍从像“饰以大珠，备极工巧”^⑤，杨琏真伽“尽取之为笠珠及香饼”^⑥，于是“观之徒云萍东西，无所于寄”^⑦。毗邻延祥观的西太一宫在改为寺院后，“道侣栖栖然侨寄湖侧，偏隘单寒，有不堪之色”^⑧。后，方回游孤山，感慨万端，作诗云：“红墙半旧粉墙新，泥塑金涂各有神。僧道不须闲计较，等为和靖守坟人”^⑨。而龙翔宫在杨琏真伽时期被改为寿宁寺^⑩。另，绍兴十八年（1148）初建于龙山之西、二十四年（1154）析涌金门外灵芝崇福寺之地重建的显应观¹¹，据成书于世祖中后期的《武林旧事》，该观“今归灵芝寺”¹²。或可由此推断，其被灵芝寺吞并也在此时。

437 页下。

^① 关于杨琏真伽其人及所作所为，参看陈高华：《略论杨琏真伽和杨暗普父子》，载《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第55-63页；《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伽》，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9-180页。

^② 王颀点校：《庙学典礼》卷三《郭签省咨复杨总摄元占学院产业》，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3-64页。

^③ 张伯淳：《大元至元辨伪录随函序》，见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第38b-41b页。

^④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三《山川二·城南诸山·孤山》，第3584页。

^⑤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孤山三提胜迹·四圣延祥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b页。

^⑥ [宋]周密撰，王根林校点：《癸辛杂识》续集下《沉香圣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第5828-5829页。

^⑦ [元]任士林：《松乡集》卷二《四圣延祥观碑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9b-31b页。

^⑧ [元]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六《故道录章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6b-8b页。

^⑨ [元]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四《望西太乙宫四圣观半为僧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第21b-22a页；“和靖”即林逋。建四圣延祥观时，诸寺迁移，唯林逋墓保留。《桐江续集》卷二十三《记正月二十五日西湖之游十五首》其一，第15b页：“情知太乙已西游，筑馆焉能强挽留。此老平生让人者，佛来我去尚何求。右旧西太乙宫改寺。”其二，第15b页：“一夜缙郎划醮坛，三清四圣化泥团。也曾输与林灵素，顶上曾纓德士冠。右旧四圣观改寺”。

^⑩ [明]徐一夔：《始丰稿》卷十一《重修龙翔宫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b-17a页。

¹¹ [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宫观》，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光绪七年（1881）《武林掌故丛编》本，第3217页；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寺观五·寺院·自涌金门外至钱湖门·灵芝崇福寺》，第4072页。

¹²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南山路·显应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笔记

原御前宫观田地产业被侵夺，据载，有被强改为佛寺的西太一宫、四圣延祥观和龙翔宫。杨琏真伽时期，西太一宫“前住持有献宫田于官者”^①。四圣延祥观在南宋高宗时，朝廷“拨赐田地山荡，隶杭、苏、湖、润，总若干顷”^②；光宗时，实力进一步增强，“朝廷积赐缗钱以千计，田亩以万计”^③。被改作寺院后，观中田土被剥夺，直到大德元年（1297）才得以归还^④。龙翔宫的田土亦被占，后经住持“力于匡复，有词于上，获归土田者半”^⑤。

原御前宫观的道士被迫还俗或剃发为僧的情况当不少见。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到二十四年（1287）春，杨琏真伽“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挂冠于上永福帝师殿之梁拱间”。延祥观提点胡某就在此时“舍邪归正”^⑥，弃道为僧。而前述该观和西太一宫那些“云萍东西”、“有不堪之色”的道士，以及道观被改为寿宁寺的龙翔宫道士中，或有不少与胡某一样转投释氏，或还俗为民。

被强改为佛寺的4所原御前宫观之外，距吴山不太远的宗阳宫一直处于“堕劫灰之余，瓦砾未疏，玄奘采集”^⑦的状态，十分萧条。位于宗阳宫后的佑圣观在至元十七年（1280）冬被毁，“惟门台及陆君宗补白斋存焉”^⑧，此后，“观宇久弊”^⑨。杨琏真伽时期，9所原御前宫观中，似乎只有开元宫和三茅宁寿观未受重创。开元宫毗邻江浙行省衙署，入元之初的十余年虽未见修造活动，但至元二十八年（1291）被省衙火灾殃及后，住持董德时在行省的支持下，很快易址重修新宫于杭州城北的清湖之西，并于至元三十年（1293）获玺书护持^⑩。而方回在《武林感旧》中写道：“三茅观顶灯犹在，六部桥南塔顿新。试问众生诗得意，袈裟底下自由身。”¹¹“六部桥南”是南宋宫城的午门，“塔顿新”当指杨琏真伽刚在宫城之上新建了5所厌胜寺院¹²，“袈裟底下自由身”指代僧人势力之盛，“三茅观顶灯犹在”则说明此时三茅观未受重创。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茅观道士刘祖华建普同塔，以收瘞杭州被焚化者的骸骨¹³亦可证明这一点。

小说大观》影印民国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第171页上。

^① [元]张伯淳：《养蒙先生文集》卷四《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第141-147页。

^② 任士林：《松乡集》卷二《四圣延祥观碑铭》，第29b-31b页。

^③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引张贵谟《四圣延祥观记》，第3486页。

^④ 任士林：《松乡集》卷二《四圣延祥观碑铭》，第29b-31b页。

^⑤ [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三《杭州龙翔宫重建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2b-14b页。

^⑥ 张伯淳：《大元至元辨伪录随函序》，见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第38b-41b页。

^⑦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大护持杭州路宗阳宫碑》，第23a-25a页。

^⑧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六《杭州祐圣观记》，第1b-2a页。

^⑨ [明]王祚：《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嘉靖元年（1522）刻本，第284-287页。

^⑩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杭州路开元宫碑铭》，第23a-25a页。

¹¹ 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八《武林感旧又二首》，第31b页。

¹² 杨琏真伽任江南释教都总统期间，掘毁南宋诸帝陵寝，“下令哀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又在原南宋宫城之上新建5所寺院，以加强厌胜。见[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发宋陵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第43页。

¹³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五《普同塔记》，第20a-22a页。

至于东太一宫，笔者目力所及，相关史料极阙。据《洞霄图志》，南宋时期曾任太一宫观妙斋高士的余杭大涤山冲天观道士周允和，“至元戊寅（十五年，1278——引者），授崇道冲应清真大师，洞霄主席。壬午（十九年，1282——引者）三月，兼领太一宫。秋九月，复还九锁”^①。则（东）太一宫在元初尚存，且影响犹在。另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洪武三年（1370），杭州将社稷坛徙建于钱唐门外西北，坛址乃“宋太乙宫故基也”^②。此“太乙宫”显然是东太一宫，而非位于孤山的西太一宫。田汝成透露的信息是，宋代的东太一宫在入元以后长期处在破败隳废的状态，直至仅剩基址，且基址长期荒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毁于杨琏真伽时期，二是毁于元末徐寿辉部、元军、张士诚部或朱元璋部的战火之中，三是毁于失火等意外之灾。笔者很难找到东太一宫在世祖至元后期直到元朝末年的相关信息^③，推测该宫可能毁于杨琏真伽时期，或此前此后的意外之灾，且宫观被毁以后，未予重建；否则，以东太一宫在宋末和元初的影响，以杭州这样一个人文渊薮之地，不至于记载如此缺失。

由此，在世祖至元时期，杭州的9所原御前宫观不仅从其他宫观难以企及的“御前”高位下降为凡常宫观，还因此时恰值崇佛抑道的艰难时期而受到打击。9所宫观中，西太一宫、四圣延祥观、龙翔宫和显应观被改为佛寺或被佛寺吞并，田土被占，道士被逐；宗阳宫和佑圣观长期凋弊，难以兴复，而东太一宫可能从此荒废；只有开元宫和三茅宁寿观在正常延续。而且，这一时期，除火灾后的开元宫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后得以易地重建，其余宫观均未见有修造活动。因此，在元前期，9所原御前宫观消失殆半，幸存者亦多处于衰弊状态。

二 元中后期原御前宫观的兴复

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铁穆耳继位，道教逐渐从厄运中恢复过来，杭州的多数原御前宫观也渐次改观。

9所原御前宫观中，确知有6所在成宗以后兴造了殿宇。大德元年（1297），“有旨江浙行省，拨杭天宗河之北官地若干，俾兴四圣延祥观”^④。得旨后，玄教宗师张留孙令弟子吴全节提点该观，与杜道坚、孙益谦、吴存真等人共建新宫。大德九年（1305），新宫建成^⑤。西太一宫在郎如山、章居实的苦心经营下，购得南宋和王

^① 邓牧：《洞霄图志》卷五《人物·国朝·周崇道先生》，第21a-22a页。

^②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十三《北山分脉城外胜迹·祠庙·社稷坛郡厉坛》，第2a页。[明]刘伯缙修，[明]陈善纂《（万历）杭州府志》卷四十六《祠庙上》（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明万历七年刊本，第2946页）亦载：“社稷坛，在府城钱塘门外西北，宋太乙宫故址。”

^③ 前引《庙学典礼》卷三《郭签省咨复杨总摄元占学院产业》中有“杭州太一宫、四圣观、林处士祠堂”等在杨琏真伽时期被僧人强占。笔者以为，此太一宫是西太一宫，而非东太一宫，原因是西太一宫与四圣观、林处士祠堂同处孤山，也确被改为寺院。

^④ 任士林：《松乡集》卷二《四圣延祥观碑铭》，第29b-31b页。

^⑤ 任士林：《松乡集》卷二《四圣延祥观碑铭》，第29b-31b页。

杨存中在栖霞岭黄山的荒圃，于大德中期重建新宫^①。龙翔宫原道士以私资买下杭城西北隅原杨存中王府旧基，自大德元年（1297）开始筑新宫，建成后的新宫比昔日更为宏丽^②。佑圣观于至元十七年（1280）遭毁后，长期凋弊，元贞元年（1295）才“百础齐筑”^③。修复后的佑圣观“高居邃宇，丛房联序，震撼冲敞，昔旷今完”^④。大德六年（1302）十月，观中玄武殿遭灾，两年后便很快重修而成。宗阳宫在历经了二十余年的萧条之后，大德八年（1304），杜道坚任住持提点，重振旧观^⑤。开元宫于至元末期易址重建后，经成宗、武宗、仁宗朝持续修造^⑥，宫宇终至“光华震撼，遂甲诸方”^⑦。另，被灵芝寺吞并的显应观何时兴复，不太明朗，略知龙虎山张天师的重要弟子程元翼（一作程天翼）于明初“游京师，尝侍祠竹宫。居久之，出领镇江某观事。遂加号真人，迁领杭州显应观”^⑧。龙虎山天师张正常首次前往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朝觐朱元璋发生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⑨，而记述程元翼主领显应观的王祎逝于洪武七年（1374）。可以想见，由元入明的这10年间，显应观具有较高地位，而这种地位当自元代相沿而来，而非远溯至南宋。由此，显应观被灵芝寺吞并后，在元中后期得以恢复。三茅宁寿观在元中后期是否曾予修造，难得其详，但至正元年（1341），该观遭火灾^⑩，而至正中后期，仍有贡师泰等人流连其间¹¹，观中还会举行斋醮活动¹²。也许，火后的三茅观会有规模不大的修整。由此，9所原御前宫观中，除东太一宫情况完全不明外，6所确曾兴复了宫宇，2所可能有修造活动。

原御前宫观恢复和增拓田地产业的努力也颇有成效。四圣延祥观易地重建时，“凡田地山荡旧隶观者，复籍入”¹³。西太一宫被献官的田土经郎如山“力诋其欺，而旧物以还”¹⁴。龙翔宫在杨琏真伽失势后，获归一半田土，拥有仁和（今属浙江杭州）、平江（治今江苏苏州）、湖州（今属浙江）的三处庄田¹⁵。宗阳宫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萧条之后，“凡土田之在华亭登瑞者，以赐以贄”¹⁶。佑圣观则在旧有

^①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六《故道录章公墓志铭》，第6b-8b页。

^②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三《杭州龙翔宫重建碑》，第12b-14b页。

^③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六《杭州祐圣观记》，第1b-2a页。

^④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杭州佑圣观玄武殿碑》，第25a-26b页。

^⑤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大护持杭州路宗阳宫碑》，第23a-25a页。

^⑥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杭州路开元宫碑铭》，第23a-25a页；[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七《开元宫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9b-11b页。

^⑦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杭州路开元宫碑铭》，第23a-25a页。

^⑧ 王祎：《王忠文公文集》卷八《心迹双清亭记》，第154页；[明]危素：《危太朴续集》卷一《送程南溟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嘉业堂本，第19a-20a页。

^⑨ [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五《四十二代天师张公神道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6b-9b页。

^⑩ [元]吴景奎：《药房樵唱》卷一《钱唐三茅观古梅五代时所植至正辛巳毁于火次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b页。

¹¹ [元]王逢：《梧溪集》卷三《登吴山三茅观访贡尚书留宿口号》，《知不足斋丛书》本，第52b页。

¹² [明]凌云翰：《柘轩集》卷四《赠龙翔宫道士毛起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a-18a页。

¹³ 任士林：《松乡集》卷二《四圣延祥观碑铭》，第29b-31b页。

¹⁴ 张伯淳：《养蒙先生文集》卷四《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第141-147页。

¹⁵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三《杭州龙翔宫重建碑》，第12b-14b页。

¹⁶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大护持杭州路宗阳宫碑》，第23a-25a页。

土田之外，还增加了不少信众捐施的田土，设“施田提点住持”专门负责管理^①。

随着殿宇和田产的恢复，原御前宫观的斋醮及其他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如供奉北极佑圣真君的佑圣观，因三月三日为真君圣诞日，南宋时，每年的这一天，“降赐御香，修崇醮箓。午时，朝贺，排列威仪，奏天乐于墀下。羽流整肃，谨朝谒于陛前，吟咏洞章陈礼。士庶烧香，纷集殿庭。诸宫道宇俱设醮事，上祈国泰，下保民安。诸军寨及殿司衙奉侍香火者，皆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于道。观睹纷纷。贵家士庶亦设醮祈恩，贫者酌水献花。杭城事圣之虔，他郡所无也”^②。元中期，该观以信众捐施的田土收益作为“三月三日斋醮费”^③，恢复了这一活动。虽然没有了御香和朝贺，但繁闹不减^④。到明洪武时期（1368-1398），此观仍是杭州知府礼请道士祈雨的重要场所^⑤。再如开元宫，泰定四年（1327），宫中住持王寿衍协同张天师举行禳退海潮的醮仪。后至元元年（1335），王寿衍又在延祥观举行金箓大醮^⑥。而三茅观在至正二十四年（1264）举行祈晴斋醮，监斋者是龙翔宫道士毛起宗^⑦。宗阳宫的活动也不少。大德十一年（1307），宫右新筑老子祠，宫中道士杜道坚等“执简曳佩，执事有恪；筮豆有仪，拜跪有容”^⑧。至于显应观，宋时该观在每年六月六日崔府君诞辰日，“都人士女骈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⑨，很是热闹，入元以后，这一活动是否得以恢复，情况不明。

渐次兴复后的多数原御前宫观在道教中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南宋时，诸御前宫观的教门公事由江南道教首领龙虎山张天师负责^⑩，担任住持者则多为顶级道士，如高宗建四圣延祥观后，开山住持是左右街都道录彭德淳¹¹；龙翔宫建成后，理宗“命左右街都道录胡莹微为开山住持，以重其地”¹²；左右街都道录

^① [元]胡长孺：《佑圣观捐施题名记》，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03页。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三月（佑圣真君诞辰附）》，第1a-1b页。

^③ [元]胡长孺：《佑圣观捐施题名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903页。

^④ 延祐三年（1316），胡长孺《佑圣观捐施题名记》这样描述佑圣观的繁闹：“岁元旦至上巳□节朔望，虎林士女，大集庭下，势若禹峡春流，胥祷秋壮，□壑赴岸，灭前拥后，推轳骑巷，休舆轿道，息武无可布视。不得留集者，亦威严戒洁斋，澡涤洗沐，专一志虑，肃齐形容，喜怒不行，哀乐不入，好恶不作，骄吝不生，灵府明清，淳湛静莹，俯仰鞠躬，瞻望象仪，香氛烛光，星雾隐见，云冠霞佩，芝盖华幡，御气乘风，辉映颺举。聆音覩影，忽儻后先。其或孝隆尊亲，慈覃幼稚，义钟伉俪，爱厚弟昆，益友善邻，嘉姻懿戚，祷言甫发，响答旋臻，疾疹遂瘳，菑□□弭，讼争销释，吉庆大来。敬极信深，忘吾有己，□□□□，聚散无常，倾廩倒囊，非所吝惜。”

^⑤ [明]谢肃：《密庵文稿》辛卷《赠王高士祷雨诗序》，《四部丛刊三编》本，第13a-14b页。

^⑥ 王祎：《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284-287页。

^⑦ 凌云翰：《柘轩集》卷四《赠龙翔宫道士毛起宗序》，第16a-18a页。

^⑧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老子祠碑》，第10b-12b页。

^⑨ 周密：《武林旧事》卷三《都人避暑》，第159页。

^⑩ [元]元明善修，[明]周召续编：《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可大》载，南宋理宗曾敕龙虎山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三洞拾遗》影印明代修补续增本，第17页下）。杨维桢：《杭州龙翔宫重建碑》（《东维子文集》卷二三，第12b-14b页）载淳祐六年（1246）龙翔宫住持是“元静先生一庵胡公”，宝祐（1253-1258）时期，“承之者为古泉胡公”，未提及张可大主领龙翔宫事。

¹¹ 任士林：《松乡集》卷二《四圣延祥观碑铭》，第29b-31b页。

¹² 徐一夔：《始丰稿》卷十一《重修龙翔宫碑》，第13b-17a页。

留用光曾任太一宫都监^①，等等。部分御前宫观还设有高士斋，以安置道术超诣的高道^②。入元，多数原御前宫观的主领依然是高道，且拥有远超本宫观事务的权力。至元十八年（1281），奉旨主领四圣延祥观的张留孙此前已经担任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还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务。至元二十年（1280）前后，任西太一宫同都监的郎如山同时兼任浙西道判^③，该宫提点马某也曾兼任浙西都道录^④。宗阳宫住持提点杜道坚在大德八年（1304）曾任杭州路道录^⑤。佑圣观住持薛玄曦一度兼领杭州诸宫观^⑥。而龙翔宫在大德九年（1305）由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主领宫事^⑦，后至元三年（1337）又迎来另一位天师——三十九代张嗣成担任住持，张氏还同领杭州路诸宫观^⑧。至于开元宫，元中后期长期主领该宫的王寿衍在至大元年（1308）担任金议教门公事^⑨，延祐元年（1314）拥有二品银印，“尽护杭州诸宫观”^⑩，而当时玄教二号人物吴全节的玄教嗣师银印也不过是“视二品”^⑪。元代显应观主领道士的情况不明，但前述明初程元翼主领观务表明此观在当时拥有可与程氏相匹配的重要地位。这样一批重要道士坐镇原御前宫观，足见这些宫观虽然已不再是全国最重要的一批道观，但仍拥有超出普通道观的地位。这是其旧有地位在历经王朝更替后的延续。

更为重要的是，原御前宫观在元中期获得了此前所不曾拥有的独立财权，经济自主，且不断受到来自朝廷的特殊呵护。

南宋时期，诸御前宫观由属于内司官的“御前诸宫观提点”^⑫负责“出纳金谷、日膳道众、修崇醮款，凡有修整宫宇，及朝家给赐银帛，殿阁贴斋钱帛，并皆主计给散”^⑬，即御前宫观的钱粮事务由宦官主管，各宫观没有独立的财权。理宗时期声焰熏灼的宦官董宋臣在宝祐三年（1255）“兼干办佑圣观”，景定四年（1263）又“提点显应观”^⑭。身为宦官的“入内内侍省都知”张某也曾提点佑圣观^⑮。入元以后，江南的土地和田赋政策于南宋有很大的继承性，9所原御前宫观田土的官田

^① 元明善修，周召续编：《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下·高士·留用光》，第31页下。

^② 参阅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第十六章《南宋御前宫观的高士》，第460页。书中称，设有高士斋的宫观只有东、西太一宫和佑圣观、龙翔宫、宗阳宫这三处由潜邸改建的宫观，宁宗潜邸开元宫未见有高士斋。

^③ 张伯淳：《养蒙先生文集》卷四《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第141-147页。

^④ [元]郑元祐：《遂昌杂录》，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笔记小说大观》影印民国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第36-37页。

^⑤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大护持杭州路宗阳宫碑》，第23a-25a页。

^⑥ [元]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九《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7b-10a页。

^⑦ 杨维禎：《东维子文集》卷二三《杭州龙翔宫重建碑》，第12b-14b页。

^⑧ 杨维禎：《东维子文集》卷二三《杭州龙翔宫重建碑》，第12b-14b页。

^⑨ 王祚：《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284-287页。

^⑩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七《开元宫碑》，第9b-11b页。

^⑪ 《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第4528页。

^⑫ 吴自牧：《梦粱录》卷九《内司官》，第13b页。

^⑬ 吴自牧：《梦粱录》卷八《御前宫观》，第8a页。

^⑭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六十九《董宋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3675-13676页。

^⑮ [元]刘大彬：《茅山志》卷四《诰副墨·宋诏诰·淳祐加封三茅真君诰》尾署，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道藏》本第5册，第572-573页。

性质当被延续，但管理方式随着内侍的退出发生了变化。

至元十六年（1279），元朝“以宋谢太后、福王所献事产，及贾似道地土、刘坚等田，立总管府（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引者）以治之”^①，即设立江淮都财赋府管理南宋部分皇室和权臣的田产，治所在杭州。诸御前宫观与南宋皇室关系密切，入元以后，其土田可能亦由江淮都财赋府管理。王祎《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载，“先是（至大元年，1308年以前——引者），杭之九宫观财用出纳隶都财赋府。及是（皇庆二年或延祐元年——引者），太后有旨，都府勿有所与”^②。“杭之九宫观”即同文所称的“开元等九宫观”。王祎未确指“九宫观”包括哪些宫观，但开元宫系原御前宫观，笔者以为，此“九宫观”即是以开元宫为首的9所原御前宫观。如果这种猜测成立，那么，9所原御前宫观的财用出纳由江淮都财赋府管理。

然而，江淮都财赋府于“大德四年罢，命有司掌其赋。天历二年复立，其赋复归焉”^③。由此，大德四年（1300）以后，原御前宫观的田产及财用当转由地方官府管理，仁宗时期答己太后懿旨中的“都府”显然不是江淮都财赋府。

这时，杭州城内有另一个都财赋府——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始设于至大元年（1308），目的是管理籍没的朱清和张瑄田产^④。笔者认为，大德四年（1300）以后原御前宫观的田产及财用转由地方官府管理时，对地方官府而言，这些原御前宫观的田产收益与南宋皇室权臣的地土收益是不一样的，后者只需转缴即可，诸宫观则因财用出纳不能自主，其田土的收益存在转拨转支、甚至监督使用的繁烦程序，加之其产业散处各地，由各地官府分管更是不便。于是，当至大元年（1308）成立江浙都财赋府时，原御前宫观的田产和财用即转由江浙都财赋府管辖。所以，开元宫住持提点王寿衍在这年“被玺书及兴圣太后（武宗、仁宗之母答己——引者）旨，加开元等九宫观”^⑤，可能就是答己太后要求江浙都财赋府及相关地方官府对原御前宫观的财用出纳给予方便和照顾。据《（雍正）浙江通志》，“财赋都总管府在佑圣观东，今入武林驿。江淮财赋总管府在前洋街”^⑥。元代立司于杭州的财赋都总管府只有江淮和江浙两个，在佑圣观东者显然是江浙都财赋府。其位于佑圣观附近，或许就有便于管辖诸宫观财用的目的。

仁宗前期，答己太后下旨，此后诸原御前宫观的财用出纳，“都府勿有所与”^⑦。“与”即“與”，涵义颇多，易引起歧义，而“给予”和“参预”两种不同的涵义

^① 《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五》，第2261页。

^② 王祎：《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284-287页。

^③ 《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五》，第2261页。

^④ 《元史》卷二十二《武宗纪一》，第499页。

^⑤ 王祎：《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284-287页。

^⑥ [清]李卫等修，[清]沈翼机、傅王露等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三十九《古迹一·官署·元官署》，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7b页。

^⑦ 王祎：《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284-287页。

更使全句意思全然相反^①。取“给予”之意，意味着此后都财赋府不再将所管产业的收益交由原御前宫观使用；取“参预”之意，则表示此后都财赋府退出诸宫观财用出纳的管理事务。综考上下文意，撰文者王祜显然是采后者。由此，一直没有独立财权的原御前宫观终于在仁宗前期获得了擅收擅支的独立财权。这是元代中后期兴复原御前宫观的重要事件。

而且，部分原御前宫观屡屡得到来自蒙元皇室的垂青，不断获得朝廷的玺书加护。宗阳宫和龙翔宫是首先获得新朝玺书护持的原御前宫观^②。大德时期（1297-1307），西太一宫和四圣延祥观也得到护持玺书^③。而开元宫先后于至元三十年（1293）、大德八年（1304）、泰定二年（1325）和后至元元年（1335）四次得到玺书护持^④。由此，原御前宫观中至少有5所明确得到元朝的特殊照顾。这种特殊照顾不仅体现在朝廷以玺书形式令“所在有司宜加持护，毋容它人妄相侵夺，毋以差役相毒，以致不安”^⑤，还体现在当宫观有非违行为时，“官府不能诘治”^⑥。加之部分原御前宫观的主领道士，如开元宫的王寿衍等往来京师与杭州之间，时常近承天光，更使得某些宫观可能拥有拥有凌驾官府的权力。

因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充裕的财力、朝廷的特殊呵护以及高道坐镇其间，部分原御前宫观还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中心。著名道士张雨晚年居三茅宁寿观，广储图史^⑦，使三茅观成为儒风昌盛的道教宫观。杜道坚在宗阳宫期间，储书数万卷^⑧，与文人雅士、得道高僧往来密切，遂使宗阳宫成为元中后期杭州士人雅集的胜地。杨载就因一次雅集赋诗《宗阳宫望月》^⑨而声名雀起，同时也让此次盛会长久萦绕在儒者的心中^⑩。而王祜不仅在至正十一年（1351）与朱石、陶凯、郭公葵、陈秉彝

^① 出于谨慎，除仔细核对《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嘉靖元年《王忠文公文集》外，笔者还查阅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忠文集》、《金华丛书》本《王忠文公文集》等不同版本，均为“都府勿有所與”。

^②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大护持杭州路宗阳宫碑》，第23a-25a页；杨维禎：《东维子文集》卷二三《杭州龙翔宫重建碑》，第12b-14b页。

^③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六《故道录章公墓志铭》，第6b-8b页；任士林：《松乡集》卷二《四圣延祥观碑铭》，第29b-31b页。

^④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杭州路开元宫碑铭》，第23a-25a页；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七《开元宫碑》，第9b~11b页；王祜：《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284-287页。

^⑤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二《中堂事记下》，《四部丛刊初编》本，第9a-9b页；中统二年（1261）七月二十三日癸未，“是日，有旨与老王姑护持玉华宫圣旨者。其辞曰：‘炼师王道妇赋性纯正，矢志不回，挺然有古烈妇之风。奉侍我太上皇、皇太后积有年矣，周旋之间，曾无过举。当时雅为敬重，使之入道。为此，先帝常加赐予，已勅令真定管民官选择佳地，起盖宫观，资给衣粮，仍以玉华之名赐之，以为我家祈福之地，朝夕焚诵，用报我皇考妣罔极之恩。所在有司宜加持护，毋容它人妄相侵夺，毋以差役相毒，以致不安；常教告天，与皇家子孙祝延福寿。’”

^⑥ 《元史》卷二十《成宗纪三》（第439页），大德六年（1302）正月，“江南僧石祖进告朱清、张瑄不法十事，命御史台诘问之。帝语台臣曰：‘朕闻江南富户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卿等尝闻之否？’台臣言曰：‘富民多乞护持玺书，依倚以欺贫民，官府不能诘治，宜悉追收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这段文字是针对拥有护持玺书的富民而言，某些道观的行事可能与此相类。

^⑦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五《方外玄踪》，第11b页。

^⑧ [明]朱右：《白云稿》卷三《杜南谷真人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a-16b页。

^⑨ [元]杨载：《翰林杨仲弘诗集》卷六《宗阳宫望月分韵得声字》，《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a页。

^⑩ [明]张昱：《可闲老人集》卷四《宗阳宫次杨仲弘老君台观月诗韵》，其中有“当时诸老宗阳会，月与浮云几变更”之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第1a页。再如凌云翰：《柘轩集》卷二《次杨仲弘宗阳宫对月韵》，第21a-21b页。

等会于宗阳宫^①，其后更以此宫作为抵杭后的假寓之馆^②。而奉化学者任士林在杭州期间，还一度把开元宫作为学馆^③，在其中教授生徒。

元代中后期杭州原御前宫观的兴复，得益于成宗登位以后的道教政策及诸宫观在南宋的地位。这时的原御前宫观虽然丧失了“御前”身份，但通过王寿衍等部分主领道士的时常朝觐和频繁获得元廷的玺书护持，原御前宫观依然与最高统治者保持着联系，且拥有了前朝所没有的独立财权，开元宫还进一步取得了专任本宗弟子担任住持的特殊权力（此待后文再述），这些均表明了宋元两代江南道教发展的延续性。

三 元代原御前宫观彼此间的地位

成书于南宋咸淳七年至十年间（1271-1274）^④的《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共录10处宫观，依次是太一宫、西太一宫、万寿观、佑圣观、开元宫、龙翔宫、宗阳宫、四圣延祥观、宁寿观和显应观。其中，万寿观是否得列“御前”，情况不明。成书于咸淳十年（1274）的《梦粱录》卷八《御前宫观》所录9处宫观依次是太一宫、西太一宫、佑圣观、显应观、四圣延祥观、三茅宁寿观、开元宫、龙翔宫和宗阳宫。两者的成书时间大体一致，9处御前宫观的排序不同，或许是诸宫观地位高下不同的反映，又或是作者的认识不同所致。

《梦粱录》还称，宋末临安府诸宫观，“在城宫观则以太乙、万寿为首，余杭洞霄次之”^⑤。前文和相关注释已言及，万寿观确实重要，但不知是否得列“御前”；余杭的洞霄宫历史久而影响大，但此宫距杭城稍远，不便皇帝行幸，故未列“御前”。而无论如何，两处关乎国祚民运的太一宫自是最重要的，故列于最前。“奉今上皇帝（度宗——引者）元命”^⑥的佑圣观也是极重要的，因而被潜说友和吴自牧不约而同地排在前列。其余6处御前宫观，潜说友和吴自牧的排序则不同。开元宫、龙翔宫和宗阳宫分别由宁宗、理宗和度宗的潜邸改建而成，四圣延祥观、三茅宁寿观和显应观则以供奉与赵宋关系密切的民间和道教神灵为核心。担任知临安军府事、浙西安抚使的潜说友^⑦显然更看重由诸潜邸改建的宫观，而在撰书过程中“缅怀往

^① 徐一夔：《始丰稿》卷三《题永思亭卷后》，第6a-7a页。

^② 王祜：《王忠文公文集》卷六《送詹君序》，第113-114页。

^③ [明]徐伯龄：《蟬精隽》卷七《寿光先生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a-3b页。

^④ 潜说友：《咸淳临安府志》卷七五《寺观一·表忠观》（第4028页）有“咸淳七年，安抚潜说友合庙观为一”等语。此志以“咸淳”系名，咸淳共十年，则此《临安府志》当成于咸淳七年（1271）至咸淳十年（1274）之间。

^⑤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五《城内外诸宫观》，第5a页。

^⑥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三《行在所录·宫观》，第3483页。

^⑦ 刘伯缙修，陈善纂《（万历）杭州府志》卷十四《古今守令表二》（第996页）载处州人潜说友自咸淳四年（1268）任临安知府。[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八《史部二十四·地理类一·咸淳临安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30页：“说友，字君高，处州人。宋淳祐甲辰进士，咸淳庚午（六年，1270——引者）以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知临安军府事，封缙云县开国男。时贾似道势方炽，说友曲意附和，故得进。”二书对潜氏任临安知府的时间有歧。另，潜说友《咸淳临安府志》卷七五《寺观一·表忠观》（第

事，殆犹梦也”的吴自牧则对“都人士女骈集炷香”的显应观等印象更深。潜、吴二人对诸御前宫观排序的不同更说明，在南宋时期，官方没有明确规定各御前宫观，尤其是后6所宫观地位的高下。

入元以后，这9所原御前宫观依然没有官方拟定的地位高下之分，但在实际上，各宫观的地位还是有所区别。

元初，较早北觐元廷的杭州道士中有董德时。董氏于咸淳年间（1265-1274）获赐号“修真演道法师”，为龙翔宫全真斋高士。至元十五年（1278），被征北觐。在京师，他“承旨祷旱而甘雨澍，祷雪而瑞霏”，宣授浙西道道教都提点、开元宫都监住持，不久晋号“修净通妙太极五雷宗教法师”^①。至元二十年（1283），董氏以母老告归，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其徒杭州路道录陈天锡任开元宫事。至元二十八年（1291），董氏似仍任浙西道道教都提点一职。元代浙西道管领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松江、江阴等处，由此，开元宫住持实是原南宋核心区道教事务的直接管理者。

成宗继位时，陈天锡仍主领开元宫事。此后，玄教陈义高的弟子王寿衍日益受到元廷重视。大德八年（1304），王氏制授开元宫住持提点；至大元年（1208），令议教门公事；延祐元年（1314），授弘文辅道粹德真人，领杭州路道教诸宫观事，仍住持开元宫，并给银印，视二品。泰定二年（1325），“被玺书，开元以甲乙传次”^②，开元宫改十方住持制为甲乙传次制。

这一改变对开元宫来说，很是重要。南宋时期，御前宫观多从全国选用高道作为住持，即多采用十方制^③。这种选任制度更看重道士个人的道行高下，道派只是参考因素，甚至可以不予考虑。入元以后，原御前宫观多沿用此制选任住持，但元中期开元宫住持的选任方式由十方制变为甲乙制，意味着此后只以王寿衍所属的玄教正宗弟子徒孙为住持。元统三年（1335），“有旨赐额曰‘大开元宫’，伴主是宫者以甲乙传次”^④，即开元宫改名后，依旧实行甲乙制。至正十年（1350）王寿衍逝前^⑤，“念开元之传未有属，而绍玄教正系者实惟薛公（薛廷凤——引者），预署

4028页）有“咸淳七年，安抚潜说友合庙观为一”等语，则潜说友在咸淳七年任安抚使，当是浙西安抚使。

^① [宋]何梦桂：《潜斋集》卷八《璇玑观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a-13a页。

^② 王祜：《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284-287页。

^③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十六《行在宁寿观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b~6a页；三茅宁寿观建立以后，高宗“乃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观事，蒙君守亮副之，许其徒世守”，则三茅宁寿观采用甲乙制。但史料显示，南宋时期的多数御前宫观采取十方制。元代三茅宁寿观的住持情况不明。

^④ 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一《重建杭州开元宫碑》，第458-464页。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引文，“伴”当作“俾”。

^⑤ 王祜：《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称：“至正十三年庚寅十月十六日，弘文辅道粹德真人公仙化于湖州德清县百寮山之开玄道院，春秋八十有一。”至正十三年（1353）为癸巳年，庚寅年为至正十年（1350），此处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抵牾，故王寿衍卒年不明。王德毅等《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07-208页）称王寿衍生于1273年，卒于1353年，系采年号纪年。审读王祜所撰碑文，中有“至元甲申，玄教大宗师开府张公之弟子陈真人义高为梁王文学，以事至杭，馆于四圣延祥观，见公即器爱之，遂度为弟子。年甫十有五，从陈公至京师。乙酉，至上京，入见裕宗于东宫”等语。甲申为至元二十一年（1284），王寿衍时年15岁，则当生于1270年（咸淳六年）。81岁卒，则当卒于1350

传授之文。致之时，薛公方辞大宗师之传，逊让再三，不获已，乃勉承其甲乙之次。于是集贤以闻，有旨特加薛公大真人之号，领杭州路道教诸宫观事，主领住持大开元宫事”^①。可见，大开元宫确实实行了甲乙制。这一制度保证了该宫观不受其他道教势力的侵夺，是开元宫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而且，薛氏是在放弃了玄教大宗师的职务之后任大开元宫住持的，亦足见此宫地位之高。

再看佑圣观。元贞元年（1295），王寿衍被旨提点佑圣观^②，大德四年（1300）获五品印章，次年住持提点龙兴（治今江西南昌）玉隆万寿宫。大德七年（1303），王寿衍将佑圣观提点一职传于孙益谦，次年任开元宫住持提点^③。由此可推测，成宗时期，佑圣观在王寿衍眼中，在教门当中，地位似低于开元宫。张留孙逝时（1322），孙益谦仍领佑圣观。当时，其在张氏弟子中的地位，列于玄教宗师吴全节，“以真人佩银印者”夏文泳、毛颖达、王寿衍之后，与余以诚、陈日新同属“以真人制书命者”中的第二人^④，因此，孙益谦主领的佑圣观当仍低于王寿衍主领的开元宫。孙益谦逝后，至正三年（1343），其弟子薛玄曦住持佑圣观^⑤，而在此前此后担任大开元宫住持的薛廷凤在玄教中的地位又高于薛玄曦。以故，在元代中后期，佑圣观的地位始终处于大开元宫之下。

至于四圣延祥观，至元十八年（1281），玄教宗师张留孙奉旨主领该观^⑥。但张氏长期留京，未能亲理观务，“凡观之役，一以旧褐祇事”^⑦。至元二十四年（1287），张氏代祀山川至杭州，以王寿衍“提纲四圣延祥观事”^⑧。不久，王寿衍随张氏还朝，延祥观依旧处于主领不住观的状态，以致原非佛寺改建的延祥观也被杨珽真伽强改为寺院。大德元年（1297）易址再建延祥新宫后，张留孙屡遣得力弟子或邀请高道代管观务。建新宫时，张氏令弟子吴全节任提点，且嘱杜道坚、孙益谦、吴存真等协同规划建设。然而，吴全节也是长期留于两京，于是，张氏又疏请杜道坚兼领延祥观，而杜道坚实是以杭州宗阳宫、湖州计筹山升元报德观和通玄观为重^⑨。至治元年末（1322）张氏逝时，孙益谦领延祥观，但孙氏同时还管领着佑圣观，且佑圣观列于延祥观之前^⑩。后至元三年（1337），薛廷凤主领该观，一年后兼领镇江路道教，兼任住持另外三观，继而又主领大开元宫。在这种情况下，薛氏亦难以集中精力管理延祥观。因此，元代的延祥观长期处在主领不住观而由他人代管或兼领的

年，正是至正十年庚寅，故当采干支纪年。

^① 王祿：《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284-287页。

^② 张伯淳：《养蒙先生文集》卷三《王眉叟分春堂记》，第116-118页。

^③ 王祿：《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284-287页。

^④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4b-22a页。

^⑤ 黄潛：《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九《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第7b-10a页。

^⑥ 任士林：《松乡集》卷二《四圣延祥观碑铭》，第29b-31b页。

^⑦ 任士林：《松乡集》卷二《四圣延祥观碑铭》，第29b-31b页。

^⑧ 王祿：《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284-287页。

^⑨ [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九《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1b-15a页。

^⑩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原文是“孙益谦，领杭州佑圣观、延祥观”。

状态。这对延祥观非常不利。张留孙时期，其名义的地位也许不低，但张氏逝后，其地位或已在佑圣观之下。

元中期，上述3所原御前宫观主要由玄教道士管领，龙翔宫则部分恢复了旧时张天师主领的情形。据《龙虎山志》，早在南宋理宗时期，龙虎山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奉敕“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①。这一任命不仅将张天师抬升为江南道教首领，还将由在位皇帝潜邸改建而成的龙翔宫的道教事务直接交与张可大，足见理宗对张可大的重视。元中期，随着道教复兴，张天师在浙西的活动开始频繁。大德二年（1299），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平盐官州海潮，稍后建祖师正一真君殿，以镇潮卫堤^②。从此，张天师在浙西有了据点。大德九年（1305），张与材主领龙翔宫事^③，恢复了对该宫的管领。泰定四年（1327）五月，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修醮禳退盐官州海溢^④，或曾居于龙翔宫中。后至元三年（1337），张嗣成又成为龙翔宫住持，同领杭州路诸宫观^⑤。张天师主领该宫，有利于提升其地位。但是，张天师与玄教宗师一样，亦难以长居宫中履行实际的管理职能，故龙翔宫还是多由其他道士管理，但张天师可以推举人选。“元统癸酉（元年，1333），天师太玄公（张嗣成——引者）选请洞霄史公景仁提本宫（龙翔宫——引者）事”^⑥。或许，史景仁之前的“石田郑公某、松瀑黄公某、雁荡林公某”也出自天师的遴选。除遴选管理者外，张天师还非常关注龙翔宫的其他事务。元统元年（1333）龙翔宫因火灾重修宫宇，张嗣成“施舍助二木费”，且“捐私资建大方丈，叠石为山，凿泉为沼，蒔花种木，鹤飞鹿走，恍若世外，扁之曰‘小蓬山’”^⑦。但是，这些活动无助于在实际的道教活动中抬升龙翔宫的地位。而且，笔者以为，张嗣成“同领杭州路诸宫观”之“同领”，与“兼领”一词具有不同意味。张天师长期住守龙虎山，根本不可能对杭州道教的大事小情进行实际管理，故在杭州路道教的管理活动中，“兼领”者起主要作用^⑧，“同领者”起辅助作用，是副职，甚至只是虚衔。有鉴于前述大开元宫住持王寿衍、薛廷凤和佑圣观住持薛玄曦等一度兼领杭州诸宫观，以及四圣延祥观长期归在玄教宗师名下，笔者揣测，元代中后期，龙翔宫的地位不仅次于大开元宫和佑圣观，甚至可能在延祥观之下。前述龙翔宫在元中期只获归被占的一半田土，或与此有关。

宗阳宫与杜道坚密切相关。杜氏十七岁出家于太平路（治今安徽当涂）天庆

^① 元明善修，周召续编：《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可大》，第17页下。

^② [元]刘垞：《隐居通议》卷三十《天师退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b-12b页。

^③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三《杭州龙翔宫重建碑》，第12b-14b页。

^④ 《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二》，第679页。

^⑤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三《杭州龙翔宫重建碑》，第12b-14b页。

^⑥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三《杭州龙翔宫重建碑》，第12b-14b页。

^⑦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三《杭州龙翔宫重建碑》，第12b-14b页。

^⑧ 据《元典章》卷三十三《礼部六·释道·革僧道衙门免差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影印元刊本，第1219-1220页），至大四年（1311）革罢地方的各级道司衙门后，各路道教事务改由当地某重要宫观的住持提点兼领。

观，后入茅山。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为御前道士，度宗时期获赐号“辅教大师”^①。至元十三年（1276），伯颜攻至太平，杜氏叩军门拜谒伯颜。次年，伯颜携杜氏北上入觐。其与元朝最高统治者接洽的时间早于西太一宫的董德时。南返时，杜氏“奉玺书，提点道教，领宗阳宫，仍兼升元观”^②。杜氏一直非常重视湖州计筹山升元报德观^③，此后的世祖至元年间，宗阳宫衰弊不振，或与杜氏对宗阳宫不甚措意，甚至不住宫中有关。大德七年（1303），杜氏授为杭州路道录、教门高士，仍领宗阳宫^④。道录是路级道教管理机构道录司的最高道官，用五品印^⑤。虽然王寿衍在此前的大德四年（1300）已获佑圣观住持五品印章^⑥，大德八年（1304）又获开元宫住持五品印，与杜氏品级相同，但与杜氏杭州路道录的权力相较，王寿衍显然不及杜氏。故，大德后期，杜氏在杭州的地位高于王寿衍。此后，杜氏兴复了宗阳宫，且常留宫中，否则张留孙不会疏请其兼管四圣延祥观。后，杜氏又以弟子姚志恭提点升元观，把重心真正移到宗阳宫，直至在宫中仙逝。由此，在延祐元年（1314）王寿衍领杭州路道教诸宫观事之前，宗阳宫的地位不低，或许还在开元宫之上。但是，随着杜氏于延祐五年（1318）辞逝，宗阳宫的地位逐渐下降。至治、泰定、天历年间（1321-1329），此宫一度由陈日新兼领^⑦，而陈日新在张留孙的重要弟子中，属于“以真人制书命者”，在玄教中的地位略次于开元宫的王寿衍和佑圣观的孙益谦^⑧。可见，这段时间，宗阳宫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杜道坚主领时的地位，但已居于开元宫和佑圣观之下。而且，自陈日新始，宗阳宫的主领似乎都是兼领此宫而无法实际管理宫中事务，如约在至顺到后至元年间（1330-1340）主领无锡洞虚宫的华益谦兼领宗阳宫和西太一宫^⑨，至顺三年（1332）十二月主领宗阳宫的唐永年也兼领绍兴等处本宗派宫观事^⑩。因此，元中后期，宗阳宫的主领已很难

^①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九《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第11b-15b页。

^② 朱右：《白云稿》卷三《杜南谷真人传》，第13a-16b页。

^③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九《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第11b-15b页。升元报德观原是南宋杨存中家的功德观。绍兴二十六年（1156），由杨存中提出申请，朝廷以常清观赐予杨氏。后杨氏扩建观宇，购置产业。孝宗乾道二年（1166），时为太上皇的赵构受邀至观，亲书“升元报德”观额并赐道书。参阅戴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五《计筹山升元报德观记》，第8b-10a页。

^④ 大德五年（1301）之前，宗阳宫住持提点还有叶道亨，字宽居，任职时间不详。见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三《赠清隐程居士诗序》，第12b-15b页。

^⑤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第12b-17a页：“郡置道官，用五品印。”赵孟頫：《上卿真人张留孙碑》，见陈垣：《道家金石略》，第910-913页：“置道官及宫观主者，给印，视五品。”

^⑥ 王祚：《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284-287页。

^⑦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陈真人道行碑》（第3b-5b页）：“武宗皇帝、仁宗皇帝、兴圣太皇太后皆知公（陈日新——引者）道术，宣授某法师，提举崇真万寿宫。进授提点，遂封真人，兼领龙兴玉隆万寿宫，又领杭州宗阳宫”。张留孙于至治元年未逝时，陈日新“承诏兴圣宫”。此后，除因护丧一度南归外，一直长留京师，直至天历二年（1329）辞世。笔者推测，陈日新领宗阳宫是在长留京师之时，且与玉隆万寿宫一样，也是兼领。

^⑧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

^⑨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八《洞虚宫三元祠山殿记》，《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第355-358页。据黄溥《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九《玄明宏道虚一先生赵君碑》（第10a-11b页），杜道坚弟子赵嗣祺逝后，赵之弟子“以状介真人华公来征铭”。此“华公”也许是华益谦。如此，则华益谦或与杜道坚、赵嗣祺师徒有较密切的联系。但是，杜道坚碑文和传记所列杜氏弟子中，未见华益谦之名。

^⑩ 《灵应观甲乙住持札付碑》，见陈垣：《道家金石略》，第938-941页。

专以杭州为重心，宗阳宫被明显边缘化。

另据《遂昌杂录》，福建人马某，号静斋，南宋末以道法受知于度宗。“崔中丞奉旨访好人，荐马于世皇。道法复有验，宣授浙西都道录，提点西太乙宫，恩赏殊优渥”^①。崔中丞当指至元十六年（1279）七月奉诏与牙纳朮同往江南访求“艺术之人”的崔彧^②，则马某宣授浙西都道录和西太一宫提点在至元十六年稍后。至元二十年（1280）前后，浙西道判郎如山任西太一宫同都监^③，大德三年（1299），郎氏弟子章居实任西太一宫提点，兼任杭州路道判^④。前述世祖至元中期担任开元宫都监住持的董德时所任道教都提点的职位高于马某的都道录，至元二十五年（1288）主持开元宫的董德时弟子陈天锡杭州路道录的职位高于章居实路道判的职位，显然，世祖时期，开元宫的地位在西太一宫之上。其后，西太一宫的情况不太明朗，略知至正二年（1342），年届六十的张雨在“提点开元宫”^⑤时，还充任西太一宫高士。张雨以这种身份充任西太一宫高士，说明西太一宫仍保有较高地位。而上述无锡洞虚宫住持华益谦兼领杭州宗阳宫和西太一宫的事实则说明，在元中后期，西太一宫的地位可能接近于宗阳宫。

至于三茅宁寿观，其住持情况不明，仅知元后期张雨居于观中，修《玄史》，筑藏书石室，又作黄蔑楼，广储古图史^⑥。以张雨在杭州道教中的地位和影响而居三茅观，说明此观依然具有较高地位，但可能难以比肩于前述诸宫观。

综上所述，世祖时期，由于杜道坚、董德时、郎如山等人较早与元廷接触且获致认可，其坐镇的宗阳宫、开元宫、西太一宫以及张留孙主领的四圣延祥观可能是9所原御前宫观中地位较高者，而以开元宫为最。前述余杭大涤山洞霄住持周允和在至元中期兼领东太一宫，表明此宫在元初也具有较高地位。成宗继位后，杜道坚成为杭州路道录，宗阳宫的地位或在开元宫之上。但随着王寿衍的崛起，开元宫地位日渐上升，在延祐中期杜道坚辞世之前，开元宫已然超越宗阳宫。此后，因王寿衍长居开元宫达几十年，其人在道教中的地位既高，又结纳上层，喜荐贤才，广交儒士，故能有效维持此宫长期保有最高地位。王寿衍曾经主领过的佑圣观、玄教宗师主领的四圣延祥观和张天师主领的龙翔宫居于其后。宗阳宫在杜道坚逝后还能一度勉强维持较高地位，但下降趋势明显，直至与西太一宫的地位大体接近，而无法与前述诸宫观颉颃。三茅宁寿观在元后期有张雨的活动，说明其还保有一定的影响。惟显应观和南宋时期有着“一百七十四区”^⑦庞大规模的东太一宫，在元代中后期

^① 郑元祐：《遂昌杂录》，第36-37页。

^②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第215页，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第4038页。《崔彧传》中，牙纳朮作“牙纳木”。

^③ 张伯淳：《养蒙先生文集》卷四《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第141-147页。

^④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六《故道录章公墓志铭》，第6b-8b页。

^⑤ [明]刘基：《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见[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五，《适园丛书》本，第6b-8a页。

^⑥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五《方外玄踪》，第11b页。

^⑦ 吴自牧：《梦粱录》卷八《御前宫观·东太一宫》，第8b页。

的情况完全不明。显应观在明初还能迎来张天师的重要弟子程元翼，东太一宫则仅剩荒墟。

四 从原御前宫观看元代江南几个道派的沉浮

从杭州原御前宫观在元代的变迁来看，虽然在世祖至元时期，由于佛教的压制，江南道教受到打击，但为时不长，且因而受损者在成宗以后陆续得以恢复。可见，秉持兼容并蓄政策的元朝统治者总体上还是承续了南宋时期对道教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元代取消了南宋时期对道教宫观影响颇大的宦官管理制和官员祠禄制，部分宫观还拥有了南宋时不曾拥有的经济独立权和甲乙传次制。这些改变都给予了元代道教更自由更宽容的发展空间。元代道教“兴盛的景况，相对于唐宋来说……在组织发展上则犹超之”^①正是得益于此。

元中后期，杭州道教也呈现了兴盛的景况，新宫旧观散落于杭城内外。据杭州地方志书粗略分析，元代杭城内外宫观庵堂涉及的主要道派似有茅山上清派、龙虎山正一派及道教、全真派、清微派、神霄派等^②，但势力进入原御前宫观的只有上清派、龙虎山正一派和道教，故下文将围绕原御前诸宫观，略论这三个道派在元代的变迁。

元代前中期，茅山派沿袭其在南宋的基础，以及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和杜道坚师徒较早与元朝统治者接触^③，加之杜氏学问渊深，长期住持杭州宗阳宫和纯真观^④，使茅山派得以在杭州道教中保有较高地位。杜道坚同时与道教保持着密切关系。道教大宗师张留孙曾疏请杜氏“主四圣延祥观。所至创立制度，修饬宫宇，咸为改观”^⑤。杜氏弟子40余人，姚志恭、赵嗣祺、袁德逵等皆有道行，而以赵嗣祺最著。嗣祺随师游京师，“方是时，开府上卿张公（张留孙——引者）以大宗师主教事，今特进上卿吴公（吴全节——引者）为嗣师，咸加礼遇，因挽置馆下，声誉日起”^⑥。后，赵嗣祺长期主领湖州和金陵的道教事务，只是偶至杭州。茅山派在杭城的势力已然式微，杜道坚坐镇的宗阳宫也转由其他道派控制。元后期，张雨当算茅山派较有影响的道士，其人“年三十，登茅山，受大洞经箓”^⑦，是茅山正宗弟子。但是，张雨已在元中期改投道教王寿衍门下。后，张雨虽一度回到茅山，但在晚年还是回到杭州，活动在三茅宁寿观、西太一宫和开元宫，还受道教大宗师吴全节之命，作

^① 卿希泰、唐大潮主编：《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2页。

^② 主要据[清]龚嘉儒修，李榕纂《（光绪）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寺观一》、卷三十五《寺观二》、卷三十六《寺观三》（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民国十一年铅印本，第799-803页）所载杭州城、钱塘县和仁和县中元代已有的宫观庵堂粗略分析得来。

^③ 刘大彬：《茅山志》卷四《诰副墨·大元诏诰·世祖皇帝召蒋宗师诏》，第573页。蒋宗瑛于至元十八年（1281）应诏入觐，六月卒于大都。

^④ 任士林：《松乡集》卷一《杭州路纯真观记》，第36b-38a页。

^⑤ 朱右：《白云稿》卷三《杜南谷真人传》，第13a-16b页。

^⑥ 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九《玄明宏道虚一先生赵君碑》，第10a-11b页。

^⑦ 刘基：《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见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五，《适园丛书》本，第6b-8a页。

《道德经注》。可见，到元后期，杭州茅山派的重要道士已归于玄教之下。

早在南宋时期，龙虎山正一天师及其弟子在诸御前宫观中已具有较大影响。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6)，受法于龙虎山上清正一宫的道士留用光曾任太一宫都监。庆元初，龙虎山道士易如刚(? -1231)“以符法召住三茅宁寿观，授太一宫高士。迁左右街道录”^①。宝庆元年(1225)，易氏又任“左右街都道录、主管教门公事、太一宫都监兼高士”^②。理宗时期，龙虎山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受敕命“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③。可见，南宋中后期，御前宫观中的三茅宁寿观、东太一宫和龙翔宫的道教事务一度由龙虎山正一派道士管理，诸御前宫观的教门公事也由张天师提举。

入元以后，至元十四年(1277)正月，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受命管领江南诸路道教^④，凡江南道教建新宫、修旧观、改观名、选住持、辨争讼等事，均在其职掌之内，原御前宫观的相关事务自然也由其统领。当然，这只是间接管理，原御前宫观和张天师之间还有各级道教管理机关。成宗时期，随着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主领龙翔宫事，正一天师恢复了对这处原御前宫观的直接管辖。但是，正一天师无力使龙翔宫上升为杭城最重要的道观，这与其长期局促于龙虎山，很少活动于杭州这一区域中心城市，又远离政治权力中心有直接关系。因此，相较于南宋时期，龙虎山天师对原御前宫观的影响力大减。

玄教由张留孙在世祖时期创立，教义和符箓基本属于正一派，与龙虎山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其在正一天师系统之外有相对独立的组织体系和比较稳定的专属控制区，故多数研究者将其视为龙虎山正一派的支派。至元十五年(1278)，张留孙任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成为仅次于张天师的掌管江南道教事务的道官。不久，张留孙又奉诏主管江北的淮东、淮西、荆襄等处道教事务^⑤。元廷意在通过此举，让张留孙拥有张天师辖区之外、不受张天师控制的另一处专属控制区。此后的十一年间，张留孙兼管着江北和江南两地的道教事务，是江北区的最高道官和江南区的次级道官。直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张留孙才被免除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一职，改任集贤院商议道教事，仍主管江北道教^⑥。此时的江南正处在杨琏真伽势力猖獗期间，张留孙从江南道教事务的管理活动中退出来，损失并不大。此后，张留孙先后担任集贤院同知道教事、知院等一系列职务。集贤院作为主管全国道教事务的中央官署，张留孙出任这些职务，使其拥有了更大的干预江南道教事务的权力，甚至可以睥睨

^① [元]杨諲：《至正昆山郡志》卷五《释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宣统元年(1909)《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本，第1139页。

^② 刘大彬：《茅山志》卷四《诰副墨·宋诏诰·宝庆易如刚先生敕牒》，第572页。

^③ 元明善修，周召续编：《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可大》，第17页下。

^④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第187页。

^⑤ 元明善修，周召续编：《龙虎山志》卷中《大元制诰·大宗师·授都提点》，第38页上，《领荆淮道教》，第38页上。

^⑥ 元明善修，周召续编：《龙虎山志》卷中《大元制诰·大宗师·商议集贤院道教事》，第38页上-下。

龙虎山正一天师。

至元十八年（1281），仍兼任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的张留孙通过主领四圣延祥观，将势力扩及杭城，弟子至杭州，也馆于观中^①。正是在四圣延祥观，张留孙的弟子陈义高将杭州少年、后来卓有影响的王寿衍度入玄教。至元二十五年（1288），天师张宗演授王寿衍为录妙真常法师、袁州路（治今江西宜春）道录。此时，王寿衍年仅 19 岁，张天师此举或意在重用王寿衍；同时，另一意图或也存在，即王寿衍锋芒已露，天师将其调离杭州，兼具削弱张留孙在杭城影响之作用。但是，王寿衍未曾赴任，而是改任杭州开元宫提举宫事^②。这时的开元宫仍处在董德时的影响之下，堪称原御前宫观中地位最高者。

王寿衍舍弃袁州道录这一路级最高道官的五品职位而甘愿担任杭州一处宫观的次级管理者，个中原因和细节不明，但至元二十五年恰是张留孙被免除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转任集贤院商议道教事的节点。王寿衍留在杭州，且在张留孙主领的四圣延祥观之外另求提举开元宫，其中是否有张留孙利用王寿衍延续并增强其在杭州之影响的深意，已难知晓，但此举确实影响深远。此后，由于张留孙对王寿衍的不断提携以及王寿衍自身的努力经营，玄教在杭州的势力不断上升，开元宫的强势地位也愈益明显，其由十方住持制改为甲乙传次制，更足以保证玄教对此宫的绝对控制权。此外，王寿衍还在元贞元年（1295）被旨提点佑圣观，并使此观的住持实际上也选自玄教弟子。加上玄教宗师主领的四圣延祥观、改投玄教的张雨活动的三茅宁寿观，以及陈日新一度兼领的宗阳宫，玄教控制了半数的原御前宫观。毫无疑问，玄教是杭城原诸御前宫观所涉道派中最重要者。或许，这是看着张留孙免除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职务的张宗演始料未及的，也是试图将王寿衍调离杭州的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综观玄教在杭州的立足和上升之道，其以张留孙早期担任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将触角伸入杭城为起点，后，其首领长期在集贤院主管道教事务，与皇室和勋贵显宦关系密切，高等弟子又时常往来杭城、两都之间，这些因素共同维持和发展了玄教在本非其专属控制区的江南的势力。尤其是与统治者的亲密联系，以及管理全国道教事务的权力使得玄教首领可以时常超越主管江南道教事务的张天师，或者更改张天师对玄教弟子的委任，或者置天师于不顾而直接通过皇帝或集贤院获得权力，从而极大削弱和侵夺了张天师对江南道教事务的管理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张天师则难以压制和削夺玄教在杭州原御前宫观所体现的势力。

同时，龙虎山张天师尽管多居本山而少亲禁近，但其时常朝觐，为帝室服务，

^① 王祿：《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至元甲申（二十一年，1284），玄教大宗师开府张公之弟子陈真人义高为梁王文学，以事至杭，馆于四圣延祥观。”

^② 王祿：《王忠文公文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第 284-287 页。

保持了与元朝最高统治者的常态化的联系^①，从而保证了其对江南道教事务的管理权限，维持了其在杭州道教中的影响，尽管这种权限和影响时常受到来自玄教的侵夺。

而茅山派宗师中，三十八代蒋宗曠于至元十八年（1281）朝觐元廷，但当时蒋氏已辞宗师之位；入元之初的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觐见世祖一次，世祖“降玺书，大护其教。佩印南还，三茅山悉统隶之”^②。四十四代宗师王道孟“比嗣教，朝京师，蒙恩数一如许先生”^③。可见，对于茅山派宗师，元廷仅给予其管理本山道教事务的权力。或许是由于道派日渐衰微，其后的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在嗣教之后的十余年间，似未曾入觐，而四十六代宗师王某^④的入觐情况不明。可见，茅山派首领与元朝最高统治者在日益疏离。茅山派在元代杭州原御前宫观中还能保有一定影响，应是杜道坚的个人才能和元廷对其人的欣赏所致，而非宗派原因。

由此，从杭州原御前宫观在元代的变迁可以看出，道派首领与最高统治者的亲疏程度决定了元代江南这三个道派的地位和影响，道派的盛衰系于人主的偏好。而这种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又与道派首领献诚时间的早晚、服务蒙元帝室的决心联系在一起。龙虎山天师早于茅山派宗师入觐，先期从新朝统治者手中获得了主管江南道教事务的权力，从而使茅山派宗师的权力只能局促于本山。张留孙作为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首次入觐后长留两京的龙虎山正一派代表，最终获得的是所有江南道士在禁近的代表这一身份，其依托帝室优宠创立的玄教也成为最显赫的江南道派。从这个角度看，元代江南这三个重要道派发展的基本格局在至元十三年张宗演北觐和次年留张留孙在大都后返回江南时已然确定。但是，元廷首召张天师、张留孙获知世祖、茅山派归并于龙虎山正一派之下等元代道教发展的重要事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系于各道派原有的传承历史、法术高下、民间基础等因素。

^① 参阅拙文《元代龙虎山道士在两都的活动及其影响》，载《元史论丛》第十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第 82-104 页。

^② 刘大彬：《茅山志》卷十二《上清品篇·许道杞》，第 609 页。

^③ 刘大彬：《茅山志》卷十二《上清品篇·王道孟》，第 610 页。

^④ 刘晓：《被遗漏的元代茅山宗末任掌教》，载《世界宗教文化》2004 年第 4 期，第 21-22 页。